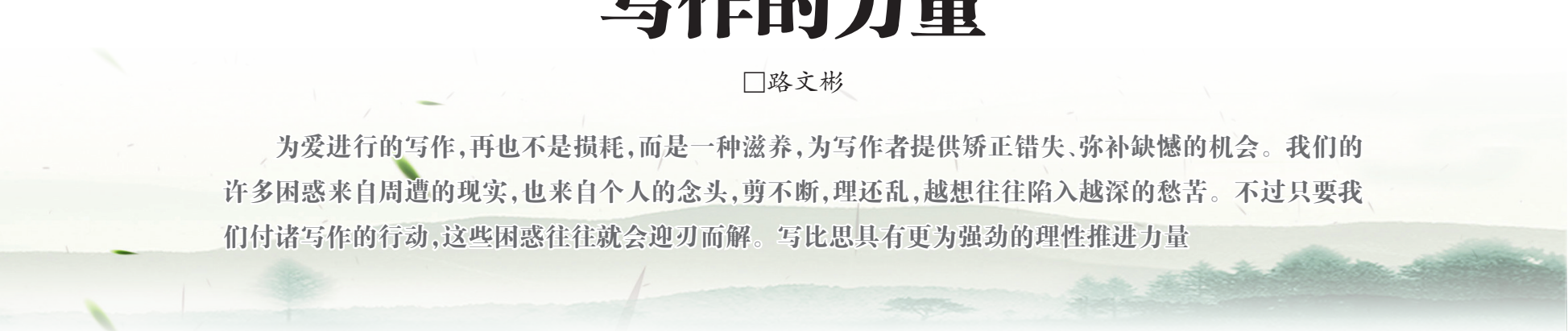


理论探索



语言是面向他人而存在的,是为了交流。如果没有听者在场,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有时我们可能会自言自語,但那也并非是真的言说。是文字使得言说意义上的自言自语成为了可能,文字之于语言的记录或者说存储功能实现了假想听者的存在,这里的假想听者亦即读者,而言说者则因此变成了作者。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正是伴随着文字的出现而出现的,尽管人类当初绝不是为了写作才发明了文字。

文字取消了语言对于声音和现场的依赖,同时让被动的听转向主动的看,语言就此赋予了主体以理性和怀疑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堪比神的创造力,故而难免动摇人类对神的既有信仰。仓颉造字所引发的“天雨粟,鬼夜哭”这一后果,暗示的恰是文字必将产生的奇迹性改变。只是,文字本身最初蕴含的此种力量全然体现为一种权力,且仅能掌控在特定阶层的手里。

好在古代中国纸墨笔砚以及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从根本上瓦解了写作固有的权力属性,进而将其“普及”成民间个人可以拥有的表达权利。如此说来,纸墨笔砚和印刷术的发明同如今的电子互联网一样,不单单是某种技术事件,其实更是一种文化事件,反映出的是文字写作的民主化进程。在我们的封建王朝历史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阻碍因素,但无法阻止这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向前发展。我以为,此种情状本身所喻示的

亦同样是写作不可遏抑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个体的写作权力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释放。一是“人人写史”。历史书写的权力与个人写作的权利就这样通过具体实践被结合了起来。借助这次写作热潮,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当家作主的地位。耐人寻味的是,这次历史写作完成的不仅是民众主人身份合法性的肯认,还提升了城市和乡村的生产力。事实表明,写作的力量既是精神性的,也是物质性的。或者说,写作不只作用于上层建筑,还能影响到经济基础。二是“人人写诗”。这进一步把写作世俗化为民间的活语权利——虽然由于发表的阵地有限,能够发表的人不是那么多。

互联网技术的横空出世实现了之前的未尽理想,使得写作和发表的权力被分配给所有人。互联网技术打破了出版印刷的垄断。当每一位写作者都可以让自己的作品被他人随时随地看见时,也就意味着他们成为了作家。写作的权利属性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来。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那些未曾有过作家梦想的人竟也意外地开始了写作,就像当年的我们写信写日记一样。

我们写信写日记不是为了要当作家,仅是为了交流,同他人交流,同自己交流。经由这样的交流,我们与他人、与自己建立起亲密的联系。不要小觑这种亲密的联系,它是个人心灵健康的保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担当着情绪疗愈的作用。写作只有在这一

情境里才是存在性的,而非占有性的。此时,写作是倾诉,是同孤独相拥,是对倾听者的创造。抚慰和疗愈恰恰是在倾诉和倾听的过程中得以奏效。至此,写作的力量不再表现为索取和征服,它变成了爱——对自己的爱,对他人的爱。在对倾听加以回应时,作者从自我的欲望束缚里脱身而出。于是乎,作者和读者之间借此自然缔结成了一种责任同盟。

为爱进行的写作,再也不是损耗,而是一种滋养,为写作者提供矫正错失、弥补缺憾的机会。在矫正和弥补之后,写作者修复了自己,看清了自己,或者说重新发现了自己。换言之,写作帮助写作者获得了重生。我们的许多困惑来自周遭的现实,也来自个人的念头,剪不断,理还乱,越想往往陷入越深的愁苦。不过只要我们付诸写作的行动,仍是写作带给她们的帮助。在这里,她们被鼓励用文字记录下自己身为女性的成长历史。因而第一次,她们开始用女性视角审视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她们写出不幸的

原生家庭,写出破碎的婚姻,写出职场的辛酸。凭借这样的写作,她们接纳了自己,爱上了自己,最终有了同命运和解的勇气。不可否认,写作于她们是光,照亮了她们,温暖了她们。

由此我想到了自己的一位诗人朋友,他常年在威海群艺馆为老年人讲授诗歌鉴赏和写作课程。每到课程结束时,学员们都会交上一份诗歌作业。出于好奇,我阅读了其中部分作业。倘若用好坏来评价它们,那完全是一种冒犯。在这些诗行里,我看到了失落的理想,看到了刻骨的爱情,看到了喜悦,看到了哀伤。最打动我的是,他们忽略了一生中的种种遗憾,选择了赞美和感激。我恍然大悟,已然白发苍苍、甚而行动有些不便的他们何以要来到诗歌的课堂。原来,他们是来这里寻找自己的,寻找那个快要被遗忘的自己。他们无意成为诗人,纵使他们拥有诗人的才华。在他们眼里,诗歌是美好的表征,有助于唤醒美好的记忆。故此在诗歌里,他们只能写下赞美和感激。

不论是女工们的纪实性写作,还是老人们的诗歌写作,他们直面的皆是真诚的个人生命体验。这种纯粹的写作让我从中领会到的是爱的强大力量,其中包含权力和权利的双重属性,而这恰好也是正义本身不可或缺的两股力量。的确,正义总是仰仗强力对权利施以保护的。那么,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写作不也是一种正义吗?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

关于“合理想象”的一点认识

□刘 虎

作为一个以写虚构文本为主的创作者,我近年来的阅读更偏向于非虚构作品,并偶然尝试进行非虚构写作。从自身写作实践来说,刺激我拿起笔来的第一动力是寻找、还原、揭示真相,抒发真情实感,坦诚面对自我。我坚持真是艺术存在的基础,唯有真才能产生善、体现美。

我尊奉的非虚构写作的第一原则便是抵制虚构。有人认为虚构是非虚构写作的组成部分。这不是什么新观念。在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就有人用“合理想象”为报告文学写作中的虚构部分进行辩护。对于“合理想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合理想象”的运用,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采访调查的不扎实引发的技术处理上的偷懒,二是立场决定的拔高或贬低的需要。有时候,写作者为了强化赞扬或批评,通过所谓的“合理想象”,将一个人不曾做过的事情、

说过的话、产生的想法加在其头上。这样的“合理想象”,很多时候是不妥当的。

但是,想要在非虚构写作中完全抵制虚构,往往很难做到。原因非常简单:人人都有个人利益、个人好恶。只要存在个人利益、个人好恶,就一定有立场。立场决定了我们的视角和对事实的解读。作者有自己的写作立场,即便没有虚构,也完全可以通过事实选择来完成写作意图。比如,一棵树上有两个果子,一个有虫子,一个没虫子,当作者独独选择有虫子的果实予以呈现,表面看说的完全是实话,可实际上呢?可见,解释权在很多时候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事件真相的看法。所以,真正的真相弥足珍贵。

选择性呈现的事实,在很多时候就是谎言。那么,有没有不进行选择的全面呈现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但我们不必为此悲观。我并非对虚构抱有偏见。文艺作品中

虚构、想象和幻想成分的存在,是因人类天生具有想象和幻想的需求及能力。这一需求在写作者和读者中都客观存在,因为想象与幻想本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虚构和幻想文本得以存立的现实依据。而且,通过虚构也可以抵达真实。但是,在非虚构写作中进行虚构,又是另外一回事。以虚构寻找真相、通过抵制虚构创作非虚构文本,是人类以不同方式抵达真相的殊途同归。

现实生活足够精彩,其自身的复杂性、丰富性正是培育优秀文学作品的土壤。虚构、想象和幻想不是文学性的唯一内涵,写实、白描同样是文学技法,优秀的新闻作品和社会调查报告也有可能是文学佳作。

非虚构写作的道路和虚构写作一样坎坷曲折,但真正的写作者依然会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任何时代都会有令人钦佩的写

作者,怀着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尊敬,怀着敢于直面自己内心的勇气探索真相。

现实生活丰富而复杂,作为写作者,我们所能坚持的唯一伦理基石就是不要自欺欺人。没有人能看到事情的全部,写作者也无需呈现自己掌握的每一个细节。生活难免有各种欺骗性,立场和价值观的选择与辨伪恰恰是抵达真实的动力而非阻力。

利益会影响写作者的立场,而只有利益符合社会进步趋势时才可能真正实现。这便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真正的写作者总是会自觉辨识、规避谎言和圈套,赋予生活、生命以正向的能量。这种选择性呈现、忽视、褒扬和批判,恰恰是打破认知局限、校正个体诉求可能引起的方向偏差的有效途径,在写作过程中完成自我修炼,创造出有营养的作品。

(作者系作家)

陈歆耕《稷下先生》在京首发

本报讯(记者 宋晗)近日,由作家出版社、上海大学非虚构写作名师工作室联合主办的陈歆耕《稷下先生》首发式及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出席并致辞。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及1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活动由上海大学传媒研究中心主任郝雨主持。

陈歆耕十多年来致力于文史创作。其非虚构新作《稷下先生》着重围绕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创办的稷下学宫展开书写,将笔墨伸向中华文明的源头,融史实、学术与文学性表达为一体,为解读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又一部优秀文本。

吴义勤谈到,作者将目光聚焦于稷下学宫,显示出独特的眼光和叙事风格。该书化繁为简,以讲稷下先贤故事的方式呈现先秦学术,让艰深的学术思想变得通俗易懂,是一部既厚重又适合大众阅读的历史文化非虚构佳作。

与会专家认为,《稷下先生》以小窗口展现大气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以别样视角展现了淄博文化和历史,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实践。

八方文讯

专家研讨朱辉长篇小说《万川归》

6月14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协办的朱辉长篇小说《万川归》创作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郑焱,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和主办方代表与会研讨。

《万川归》通过多线叙事手法,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投身时代浪潮的生命轨迹。与会者表示,作品以对时代生活的深度介入,构建了物质发展与人的精神世界的辩证关系,通过人物在现实考验中的抉择,完成了现代语境下的精神升华。作者以朴素的写作态度讲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体现出对时代与生命的哲思。

中国—新加坡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成果发布

6月18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新加坡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首批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该项目是“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与亚洲国家签署的首份经典著作互译出版备忘录,旨在进一步促进中新两国出版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在此次发布的首批成果中,小说集《受戒》收录了汪曾祺的《受戒》和《异秉》两篇小说,其英文版版权输出到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由该社出版;《新加坡环境发展史(1965—2015):迈向环境可持续发展之旅》从新加坡引进,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作品集《沙漠里的故事》收录了新加坡作家尤今的小说集《沙漠里的故事》《风筝在云里笑》和袖珍小品集《刀子会说话》,从新加坡引进,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意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启动

6月18日,由北京出版集团主办的中意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中方首批图书为史铁生《我与地坛》、傅真年《中国古

代建筑概说》,意方首批图书为伽利略《来自新科学》、贾科莫·莱奥帕尔迪《歌集》。

中意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是在中国和意大利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推动落实的重要人文交流项目,旨在通过互译出版两国经典著作,促进中意文明交流互鉴,深化出版领域务实合作。该项目以互译各10部中意两国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为目标,将为两国读者提供跨文化理解的重要窗口。北京出版集团与意大利特雷卡尼大百科全书研究院分别担任项目中意双方的主办单位。

2024 星星年度诗歌奖颁发

6月11日,由四川省作协、成都文理学院主办的2024星星年度诗歌奖颁奖典礼在四川成都举行。四川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张颖、鲁娟,《星星》诗刊主编龔学敏,成都文理学院董事长刘学民、党委书记高华锦、校长喻洪麟等参加颁奖典礼。

本届诗歌奖的3位获奖者是星星诗刊杂志社组织专家从2024年度公开发表的中国诗歌优秀文本和诗歌理论专著中评选出来的。其中,陈先发凭组诗《现象是有限的光源》获“年度诗人奖”,孙晓娅凭诗学专著《诗的女神:中国女性诗学史(现代卷)》获“年度诗评家奖”,王珊珊凭组诗《动静之间》获“年度大学生诗人奖”。第四届“文理杯”诗歌作品大赛同期颁奖。大赛分为创作组、朗诵组、鉴赏组3组,每组各有51件作品获奖。

《告别》以当代戏剧语言重释鲁迅经典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中央戏剧学院创排话剧《告别》将于7月11日在京开启首轮演出,并将于8月底作为第十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高校展演月启幕剧目与观众见面。

话剧《告别》改编自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作品基于原著思想内涵展开新的创作,在同一戏剧时空内交织不同时空,从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两个层面对封建礼教“吃人”的危害性与本质进行深入剖析,并将其升华为对人性的哲学思辨,力求通过社会环境与心灵世界的双重视域,使观众更好地审视生活与自我。该剧由刘立滨执导,杨占坤编剧,主创团队均为中央戏剧学院教师。据悉,该剧还将走进北京高校,助力戏剧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声 音

当一位抖音用户以说唱演绎《离骚》,当B站UP主用动漫解读《红楼梦》,当《唐诗三百首》被改编成互动游戏,我们不得不承认:古典文学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传播革命。这场革命不是对传统的消解,而是一次深刻的重生——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那些沉睡在典籍中的文字正以全新的姿态“活”在当代人的精神世界里。

古典文学在当代的传播困境,表面看是由于传播方式的落伍,实则是因为其与生活语境的断裂。古代文人可以即兴对诗,近现代学子能背诵大量经典,而今天,我们与古典文本之间横亘着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多重鸿沟。但数字技术恰恰提供了跨越这些鸿沟的桥梁。一位网友在弹幕中写道:“原来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是说房价问题啊!”这种看似戏谑的解读,实则是将古典文本成功植入了当代人的认知图式。当《诗经》中的爱情诗与流行情歌并列播放,当《史记》故事被改编成历史推理剧,古典文学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成为可以触摸、可以参与、可以再创造的精神资源。

数字时代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打破了知识的垄断格局。在传统社会,经典解释权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而在算法主导的平台上,一位中学老师的《论语》讲解视频可能获得比教授讲座更高的点击量。这种现象体现了传播的民主化。我们看到,苏州评弹艺术家用直播传承技艺,故宫研究员通过短视频讲解文物背后的诗文,大学生用Vlog记录重走唐诗之路的体验——这些多元化的传播主体构成了立体的文化传播网络。专业研究者不再是唯一的“守门人”,而转变为知识生态中的引导者与对话者。

技术赋能下的古典文学复兴,最动人的莫过于集体创作的智慧闪光。在一个《三国演义》的解说视频下,可能有历史爱好者考证细节,文学专业者分析笔法,游戏玩家比较不同版本的角色设定。这种开放式讨论所形成的知识场域,远比单一角度的解说更为丰富。知乎上关于“李白为什么是伟大的诗人”的讨论串,累积了上千条不同视角的回答,构成了多维度的理解图谱。当算法将这些碎片化的智慧连接起来时,我们得到的不是知识的稀释,而是认知的增值。

当然,这场变革也伴随着隐忧。流量逻辑可能导致经典被简化为猎奇片段,算法茧房可能让严肃思考被娱乐化内容淹没。数字媒介是一把双刃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抵制技术,而在于如何驾驭技术——一些团队开发的“诗词地图”APP,通过地理位置关联古典诗词,既保持了学术严谨又增强了体验趣味;一些学者用专栏文章回应网络讨论中的真问题,将碎片化思考引向系统认知。这些实践证明,专业性与普及性并非对立两极。

古典文学要在数字时代成为“活的传统”,需要完成三重转变:从单向传授到多维对话,从权威解读到多元阐释,从个体研究到集体创造。当我们在直播间里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隔空对话”,在虚拟现实漫步于陶渊明的桃花源,在互动小说里改写《西厢记》的结局时,古典文学便不再是过去的遗产,而成为未来的种子。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次点赞、每一条弹幕、每一轮转发,都是传统再生的细胞分裂。

站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看,从甲骨文到简帛,从雕版到活字,从印刷到数字,媒介变革从未中断过经典的流传。今天我们面临的不是传统的消亡,而是其生命形态的又一次蜕变。当小学生用编程复原《清明上河图》中的场景,当海外网友通过翻译软件品读李白诗作,古典文学正以我们祖先无法想象的方式活着、生长着、绽放着。这或许就是传统最美好的存在方式——不是被供奉在神龛里,而是流动在亿万人的指尖与心间。

(作者系作家)

周碧麟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周碧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5月22日在长阳逝世,享年71岁。周碧麟,土家族。202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推磨谣》《走不出你的情怀》《远方何处》《高山之上》等。

成如明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丽江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成如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6月9日在昆明逝世,享年69岁。成如明,笔名木祥,彝族,九三学社社员。201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丽江马帮》《东河啊东河》《女士司和她的后人们》《青春棚》《假如上帝还我一双手》《红灯记外传》《在云南和西藏的边缘》等。曾获云南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等。

徐俊西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徐俊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6月2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徐俊西,笔名竣东,中共党员。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赵树理评传》《文学概论》《文学的基本原理》《再现与审美》等作品。

数字时代如何让传统「活」在当下

□高 低